

福建思想文化史丛书

福建

对外文化

交流史

主编 林金水
副主编 谢必震

福建教育出版社

福建思想文化史丛书

福建
对外
文化
交流
史

主 编 林金水
副主编 谢必震

福建教育出版社

福建对外文化交流史

主 编 林金水

副主编 谢必震

福建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福州梦山巷 27 号 邮编 350001)

福州晚报印刷厂印刷

(福州西洋路 4 号 邮编 350005)

850×1168 32 开本 15.5 印张 375 千字 4 插页

1997 年 12 月第 1 版 199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300

ISBN7—5334—2030—6/G·1617 定价:23.8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由承印厂负责调换

福建思想文化史丛书

编委会

顾问 冰 心 陈元晖 苏双碧
俞元桂 刘蕙孙 何少川

主 编 许怀中

副主编 刘树勋 陈建才

编 委 (以姓氏笔画为序)

刘海峰 陈支平 陈遵沂

陈庆元 陈其芳 林仁川

林金水 徐晓望 黄保万

阙国虬

前 言

许怀中

伴随着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整个雄伟壮观的进程，必须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而这种文化是与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和经济相适应的新文化。

在社会主义新文化的建设和发展中，毫无疑问，要吸收一切外来文化的积极成果。但它必须在弘扬民族优秀文化的基地上进行，离开这个基地，新文化就无法建立，这也是绝对不能动摇的法则。

我国文化历史的悠久和丰富，在世界上是少有的。中华民族的文化，是一个有机的总体。它又和地域文化息息相关，由不同地域文化组成。地域文化是整个中华民族文化总流中的分支。

近年来，地域思想文化的研究日益成为学术研究的一个热点，它越来越受到社会的重视，其成果也越来越引起人们的瞩目。对地域文化研究越深入，就越能深刻、全面认识中华民族文化的全貌和总体。它不仅对民族文化的发展，而且对世界文化的丰富，都是一种贡献。

福建思想文化的历史悠久，内容丰富，并有它自己的特色。由于福建和台湾的密切关系，福建文化对台湾文化的影响，形成了闽台文化的地域属性。近来有的学者认为闽台民俗文化圈是我国七大民俗文化圈之一。其他如东北满汉、游牧、黄河流域、长江

流域、西藏、云贵等民俗文化圈。事实说明，无论如何分法，福建文化是我国文化总体中的一个不可忽视的优秀的组成部分。

福建文化的传统源远流长，古闽越文化的遗存、汉唐以来中原汉文化的交汇、宋元明清阿拉伯、波斯、印度与欧洲文化的东渐，使福建文化在广阔的文化舞台上有声有色。在这种文化形成和流变中，古闽越文化的基础，加上了中原汉文化的融汇而整合成福建文化的主体，深深扎根在八闽大地。又由于它在和外来文化交流中，善于吸收、融汇外来文化的思想养料而异彩独呈。在适应自然环境的变迁、社会经济的进步、时代生活的发展中，福建文化不断丰富和发展了自身的内涵，鲜明了文化个性特征和品格。

一定的文化和一定社会的政治与经济是紧密相连、密不可分的。福建经济的开发，可以追溯到秦汉时代，由于种种原因，当时闽中的经济文化还落后于中原区域。西晋末年以来，中原战乱频繁，许多中原人民相继南下，给福建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科学文化，它日益和福建丰富的生产资源结合起来，促进了闽中经济的开发。隋唐时期战乱结束，全国的统一，并随着运河的开凿所带来的南北沟通，以及中西丝绸、陶瓷之路的开辟，江南经济得到了更大的发展。封闭状态的打破，给经济发展创造了更加有利的时机和条件。福建经济的发展，改变了它在全国的地位，并促进福建与外地、外域的文化交流。曾经是海外贸易重要港口的泉州一带，外国多种宗教、建筑艺术等文化也通过这港口传入，对福建文化的发展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安史之乱后，由于黄河一带藩镇割据，战乱频繁，社会生产力遭到极大的破坏，全国经济重点不可避免地 toward 南方转移。五代两宋，福建人口骤增，开发步子加快，在农业、手工业、商业等各方面都赶上并超越了中原区域的水平，促进了福建文化的繁荣。时人赞扬说：“今世言衣冠文物

之盛，必称七闽。”（《南宋群贤小集》）福建文化自中唐以后不断发展壮大，宋代更加蓬勃，出现了一批在全国很有影响的学者，朱熹在这里开创了闽学学派。明清时期，福建人文方兴未艾，人才辈出。关于上述福建思想文化的发展历史，以往学术界虽然也作过种种探讨，但从整体来看，系统性不够，成果比较零散，研究的深度显然有待掘进。摆在读者面前的这套丛书，分成总论、闽学、宗教、民间信仰、教育、文学、闽台文化交融、对外文化交流等8册专论，是对福建思想文化史的进一步发掘、整理，也是对以往的研究成果作较为全面、系统的概括和总结，以便推进福建思想文化研究向广度、深度发展。

这套丛书于1992年5月初旬由福建教育出版社召开编前讨论会，与会专家学者对出版计划表示赞赏，愿为此书的撰写竭尽全力，以对福建文化建设事业作出奉献。

一年之后，这套丛书开始陆续编辑付印，它的姐妹篇《八闽掌故大全》丛书也已全部编就付梓。

和《八闽掌故大全》普及性通俗读物不同的是，本丛书是一套研究地域思想文化史的学术著作，它在深入挖掘和大量占有史料的基础上，写出历史特点、地域特色。当然这种地域性的史学研究，需要宏观的把握和微观的剖析，还要以当代意识和世界的目光去观照，这不仅不会抹平历史的、地方的特色，而且会对地方特色的显示更加透彻。

作为一种学术著作，应避免对福建文化现象作简单表层的描述。它不仅勾勒出福建思想文化各个领域的总体面貌，还要史论结合，以史实为依据，概括出各个领域的特点，找出规律性和共性。这也就是：它将充分反映这一区域文化的特色和研究成果，从历史角度全面、系统、深入地考察福建思想文化每一领域产生、发展、演变以及对民众、社会的渗透、影响，阐明福建在对外传

播中华文化及对港台、海外文化交流中所起的重要作用。书中注意了闽台文化的渊源、关系，不仅以单独一册阐述闽台文化交融的历史，而且在其他各册中努力去勾勒出其间的内在联系。

本丛书力求突出福建思想文化的精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福建思想文化研究领域的优秀成果，奉献给广大的读者。

这套丛书是贯彻“立足本省，面向全国，发展对外”的出版方针的产物。越是反映有福建地方性的东西，就越有世界性。鲁迅说过：“现在的文学也一样，有地方色彩的，倒容易成为世界的，即为别国所注意。打出世界上去，即于中国之活动有利。”（《鲁迅书信集·致陈烟桥》）虽然鲁迅这里说的是文学，但对其他领域也有普遍意义。通过这套丛书的出版，希望能把福建思想文化历史的研究成果推向全国，走上世界。

这套丛书的出版，将为广大读者提供比较全面、系统、丰富、准确的福建思想文化史的知识，也为进一步深入研究地方文化史的研究者提供参考。同时，为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发展社会主义新文化输送有价值的思想资料，并为国情教育、乡土教育、爱国主义传统教育，提供具体生动的材料。它在促进闽台文化研究的深入、海峡两岸的文化交流；为台湾、海外同胞寻根问祖、维系乡情、宣传福建等方面，都会产生积极良好的社会效应。

1993年7月15日于榕城

责任编辑 张永钦
封面设计 从 容

目 录

绪论	(1)
第一章 福建海上交通的兴起与宋元对外文化交流的兴盛	(16)
第一节 唐以前的福建海外交通	(17)
第二节 唐五代时期福建对外文化交流	(20)
第三节 宋元时期福建海上丝绸之路的兴盛	(30)
第四节 阿拉伯人与福建	(39)
第五节 福建与欧洲的文化交流	(50)
第六节 福建与亚洲各国的文化交流	(66)
第二章 明清时期福建海上交通的拓展	(85)
第一节 福建与郑和下西洋	(85)
第二节 福建侨民与东南亚开发及文化传播	(101)
第三节 西方殖民主义者入闽	(110)
第四节 福建——菲律宾——美洲海上丝绸之路	(138)
第五节 福建海外贸易的发展与对外物质、文化交流	(143)
第三章 明清时期福建与日本、琉球的文化交流与传播	(153)
第一节 福建与日本的贸易往来	(153)
第二节 福建文化在日本的传播	(160)

第三节	朱熹理学对日本的影响·····	(167)
第四节	福建文化向琉球传播的途径·····	(177)
第五节	福建文化对琉球社会的影响·····	(189)
第四章	明清之际来闽传教士与中西文化交流·····	(208)
第一节	明清天主教传入福建概况·····	(208)
第二节	福建士大夫与明清天主教·····	(223)
第三节	中西文化在福建的冲撞·····	(244)
第四节	福建与中西礼仪之争·····	(255)
第五节	西学在福建的传播与影响·····	(268)
第六节	朱熹理学在西方的传播与影响·····	(286)
第七节	福建学生留欧·····	(306)
第五章	福建与近代中西文化交流·····	(312)
第一节	福建走向世界的先驱者·····	(313)
第二节	福建与西方科学技术、文化的交流·····	(324)
第三节	福建三杰对中西文化交流的贡献·····	(342)
第四节	朱熹理学与闽人著述在西方的传播·····	(359)
第五节	福建华工移居海外·····	(374)
第六章	基督教传人与西方文化对福建社会的影响·····	(384)
第一节	新教传入福建概况·····	(384)
第二节	来闽传教士与福建方言·····	(401)
第三节	西方人对福建的记载与介绍·····	(410)
第四节	教会学校与福建近代教育·····	(417)
第五节	福建教会的出版、医疗事业·····	(434)
第六节	基督教与近代福建社会的冲突·····	(452)
余论	福建学者在国外与国外学者对福建的研究·····	(475)

绪 论

福建文化，作为福建人民物质与精神全部成就的总体，就是在走向世界的过程中形成和发展的。它在对外文化交流中弘扬自己，补充自己，丰富自己，提高自己，以致对外文化交流成了福建文化最鲜明的个性之一。以福建文化这个鲜明的个性，它成了我国传统文化中的一朵奇葩。同时，这个鲜明的个性又使它在整个中西文化交流过程中占有十分显著和重要的地位。

中外文化交流固然有其一般的普遍规律，但因时代、地点的不同，每每又有它的特殊性。福建倚山临海这个特殊的地理位置，注定了福建对外文化交流的特色是以海上交通和交往、或人们所称的“海上丝绸之路”为其基本的途径，离开海上交通和交往，福建对外文化交流活动几乎不复存在。这一点与西北地区在沙漠驼背上进行的丝路贸易和文化交流是大相径庭的。因此，人们以“海洋文化”来称福建文化，是最恰当不过的了，它完全符合福建对外文化交流的规律。

福建对外文化交流大致通过以下几种途径和方式：1、海上交通和交往；2、宗教传播；3、移民与手工匠的往来；4、物产移植；5、留学生与学者交往；6、思想与文学艺术的传播；7、旅游探险；8、使节派遣与友好访问，等等。这几种交流的途径，相互间并非孤立的，而是互相关联和渗透的。

福建的海上交通始于汉武帝时期，位于闽江口附近的东冶是

当时海上交通的中心。由此出闽江口，南交南海，东接北方诸港。东汉时期，交趾七郡贡品皆从东冶泛海而至中原。魏晋南北朝时期，随着汉族先人入闽开发，福建海上交通日益发展。唐五代时期，福建贸易港兴起，福州、泉州成为当时对外贸易的主要港口。唐中叶西域交通受阻，海路交通日显重要，这为福建通过海路走向世界提供了广阔的历史舞台，使福建呈现出“外域诸番，琛赆不绝”的繁荣景象。这时期福建与东亚、东南亚，以及印度等国的海上交通日益加强，所谓“市井十洲人”、“船到城添外国人”，正是当时福建对外贸易繁荣的真实写照。日本、朝鲜、三佛齐、印度、大食等国的商人和僧人，纷至沓来，成为福建与这些国家文化交流的沟通者。

宋元时期，福建海外贸易空前繁荣，泉州港海外交通之发达居全国之首，不仅成为福建对外文化交流的中心，而且也是整个中国对外文化交流的中心之一。与泉州贸易的国家有东起日本、朝鲜，南至南洋，西至印度、阿拉伯、东非海岸等40余国。以泉州为起点和终点的交通航线有6条：①泉州至占城；②泉州至三佛齐等地；③泉州经马六甲海峡至印度、波斯湾；④泉州经南三佛齐入波斯湾，沿阿拉伯海岸航行至亚丁湾及东非；⑤泉州至菲律宾古国麻逸、三屿等地；⑥泉州至高丽、日本。由泉州运销海外的物品有丝绸、布匹、瓷器、陶器、铜铁、金银、铅锡、药物、乐器、饰珠、食品、杂货等，其中以丝绸、瓷器为大宗。输入福建的物品有香料、宝货、药物、皮货、纺织品和杂物，其中以香料和宝物为主。

据何乔远《闽书》记载，伊斯兰教最早是通过“三贤”、“四贤”传入泉州的。但今学者考订，唐中期伊斯兰教传入泉州只是一种传说，伊斯兰教在泉州得到广泛传播，当在五代留从效统治时期。作为穆斯林礼拜的场所清真寺，最早建于北宋祥符二年

(1009年),位于今泉州,南临通淮街。南宋以后,来泉州的穆斯林商贾与日俱增,绍兴元年(1131年)在泉州南城又创建一所清真寺。到元至正十年(1350年),泉州已有六、七所清真寺。从这许多的清真寺以及后来发现的大量伊斯兰教墓碑和石刻,人们不难看出伊斯兰教在泉州传播和发展的规模。

泉州的穆斯林信徒,也就是侨居泉州的蕃客。因蕃客之多,民间流传有“回半城”、“半蒲街”的说法。他们在福建对外文化交流史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中国古代指南针导航技术、火药,以阿拉伯人为媒介传入西方,今天阿拉伯语中表示罗经方位的kham,就是闽南语罗针的“针”字。另一方面,阿拉伯的天文学、数学、医学等也通过海路传到广州、泉州,而后再向北传到中国其他地方。

元代马可波罗由泉州出洋,启程回国,在他撰写的《马可波罗行记》中,对福建作了相当多的记载,为后人了解和研究当时福建的政治、经济、城市、民族、宗教以及语言文学等,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历史材料。

宋元时期通过海上交通和商人来往,福建与日本、朝鲜、东南亚各国进行了广泛、深层次的文化交流。宋元丰三年(1080年)至政和二年(1112年)福州东禅寺刻印的《大藏经》,和政和五年(1115年)至绍兴十八年(1148年)福州开元寺刻印的《大藏经》,通过来闽访问修禅的日本僧人传到日本,藏于日本的各大图书馆和寺院。福建刻版的一大批书籍也通过日本商人和僧侣传入日本。不少刊本在我国已散佚,在日本却完整保留下来。当时日本缺乏优秀的刻工,常常聘请福建刻工到日本从事雕板印刷业,刻印佛经和其他典籍,为日本印刷术的发展作出重大贡献。

宋元福建与高丽关系相当密切,福建商人频繁去朝鲜经商,有“高丽王城多闽人”之说。其中有不少是被聘去的医药、画塑、乐

艺等科技人员。福建画家所画的《宣和奉使高丽图经》，是12世纪高丽王国的地理、政治、历史、经济、文化、风俗以及中朝关系的小百科全书，也是福建与朝鲜文化交流的历史见证。

随着海外贸易不断发展，东南亚各国物产纷纷传入福建，东南亚的香料被福建名医用于调配药方，大大丰富了中医药的宝库。宋真宗年间引进的占城稻，适合福建旱地播种，大幅度提高了福建的粮食产量。由东南亚传入的木棉，在福建各地广为种植，对福建纺织业发展起了推动作用。宋元时期，福建商人、水手开始侨居东南亚各国。他们带去中国先进的科学技术和文化，对当地政治、经济、军事、文化都产生深远的影响。

明清福建海上交通进一步拓展，以郑和七次下西洋为契机，福建与东南亚各国文化交流进一步展开。以16世纪的西方殖民主义入侵福建为标志，西方各国开始与福建沟通，相互间有了最初的接触和交流。福建与日本、琉球之间的文化交流也进入了鼎盛时期。

郑和七次下西洋，每次都在福建逗留。根据故宫最新档案材料，福建卫所官兵参与了郑和下西洋的活动，许多人立功受赏，为下西洋活动和福建与各国的交流作出了重大贡献。福州和泉州成为福建对外发展友好关系的窗口和前哨。在郑和下西洋影响下，亚洲各国国王纷纷遣使入明朝贡，不少人是在泉州港或太平港登陆的，受到福建市舶司和地方官员的热情接待。然后再由福州地方官吏派员沿驿道护送使节到南京或北京。回国时，又由礼部派员送到福州出港。明成祖年间埋葬在福州的古麻刺朗国王墓地和闽侯雪峰寺安置的郑和从南洋携归的两座千佛塔，就是福建与东南亚国家友好交往的历史见证。

随郑和下西洋的福建官兵，不少人留在当地，与当地人民一起种植和经商，共同开发南洋，建设南洋。菲律宾历史学家说过，

菲律宾经济生活主要依赖华人的劳动和勤苦经营,“没有华人的贡献,这个国家不能生存”。印尼、新加坡、泰国、缅甸、越南、柬埔寨也是如此。福建华侨生在异国艰苦奋斗,死后埋葬他乡,受到当地人民的尊敬。如在菲律宾发现的泉州人白丕显墓,据考白丕显生前担任过地方行政长官,死后当地人称他“本头公”。福建的文化和信仰,随着闽人侨居东南亚也传到了他们所在国。有福建人在印尼创办的明诚书院和南江书院;有在缅甸、新加坡等国建造的天后宫、马祖庙、保生大帝庙等供奉福建地方神祇的寺庙。此外,福建的民间习俗、生活方式、建筑风格、服装式样等也都通过华侨对东南亚产生影响。

明中叶以后,福建与日本的海上交通和贸易进一步拓展,沿海人民纷纷到日本经商致富,成为当地华裔的领袖。以郑芝龙为首的海商集团,就是在福建对日贸易中崛起和壮大的。郑氏集团开辟了由泉州安平直达日本长崎的航线,把中国丝绸和其他贸易物运销日本,仅1643年8月的2天就有郑芝龙的七艘船只驶入长崎,足见福建海商与日贸易的规模。通过福建与日本的贸易,福建与日本的文化交流范围不断拓宽,包括生产技术、科技、文化、宗教、建筑、绘画,以及语言文学等方面。闽日文化交流一个显著的特点,是商业贸易本身就包涵了文化交流的内容。明清福建输入日本的文化用品有书籍、墨迹、绘画、笔、墨、纸等。这些文化用品的输入,对日本的思想界、史学界、文学界、书画界、医学界都产生一定的影响。第二个特点,是流寓日本的福建商业领袖、士大夫文人,以及东渡僧侣,在中日文化交流中起了重要作用。前者主要通过海上贸易,把福建的航海造船等技术传到日本,后者主要把中国传统文化、医学、信仰传到日本。如沙县的卢草硕著有《药性集要》,被誉为日本锁国时代本草学的鼻祖。东渡日本的福建僧人为信仰需要,在日本岩原乡分紫山修建了福济寺,在

长崎创建了崇福寺。还有隐元创建了黄檗山万福寺，即非如一创建了广寿山福聚寺。他们不仅振兴日本佛教禅宗，而且在建筑、绘画、雕塑、篆刻、书法、饮食等方面给日本以深刻的影响，被日本学术界誉为“黄檗文化”。闽日文化交流的第三个显著特点，是朱熹理学在日本的传播与影响。从德川幕府宽承时代（1603年）到享保时代（1763年），正是朱子学在日本的兴盛时期。日本朱子学派就其师承关系可分为京师朱子学派、海西朱子学派、海南朱子学派、大阪朱子学派和水户学派。就其哲学思想性质又可分为主理派、主气派和理气合一派。朱子学对日本社会的思想、政治、教育、伦理道德等方面都产生重大影响，出现了一大批具有进步思想和唯物主义倾向的思想家，并成为德川幕府禁止天主教、闭关锁国的理论基础。朱子学对近现代以至今日日本社会的各方面，仍有影响。

古代琉球（今日本冲绳）位于福建东南海上，因地理位置相近，自明洪武五年（1372年）至清光绪五年（1879年）琉球被日本吞并，这500多年时间里，福建与琉球有着密切交往和特殊的联系。福建是明清两代通往琉球的唯一口岸。通过册封琉球使、琉球使团到福建、闽人三十六姓移居琉球、琉球留学生来闽、琉球难民飘流到福建，以及福建与琉球之间的贸易等六种途径，福建文化也随之传到琉球，对琉球影响至深，涉及到社会的各个方面，主要表现在语言文字、文学艺术、书法绘画、手工工艺、园林建筑、教育、医学、宗教信仰、生活习俗、生产技术等方面。福建文化的传播与影响是琉球社会进步的重要因素。

明末西方殖民主义者入闽，是殖民主义对中国侵略扩张的一个重要部分。首先入侵福建的是葡萄牙。1505年葡萄牙侵占印度卧亚，以它作为葡萄牙在东方商业、政治活动的根据地。1517年葡萄牙一支舰队由安得路德率领入侵广州，另一支船队由马斯卡